

# 晚清

## 汉学研究

程尔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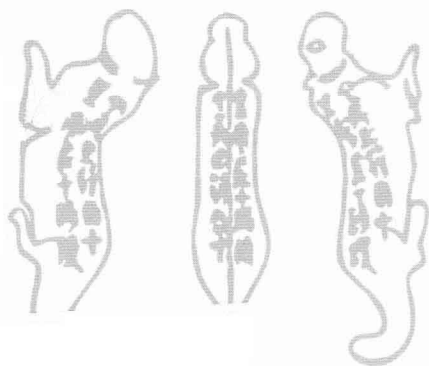
Wanqing hanxue yanjiu



人民出版社

# 晚清 汉学研究

程尔奇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晚清汉学研究 / 程尔奇著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1-012708-8

I . ①晚… II . ①程… III . ①汉学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 ① K249.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3 ) 第 245484 号



作者: 程尔奇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面设计: 徐 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2708-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                                      |       |
|--------------------------------------|-------|
| 绪 论 .....                            | (1)   |
| 第一章 晚清汉学的演进 .....                    | (29)  |
| 一 清中叶以前“汉学”语词的演变<br>与“汉学”概念的形成 ..... | (29)  |
| 二 道光时期:汉学学理的延续与新特点 .....             | (41)  |
| 三 咸同年间:汉学风气的扩展 .....                 | (46)  |
| 四 光宣时期:集大成与遭遇新问题 .....               | (50)  |
| 第二章 晚清汉学的地域分布与学脉传衍 .....             | (63)  |
| 一 江苏、安徽、浙江地区 .....                   | (64)  |
| 二 贵州、云南、四川地区 .....                   | (82)  |
| 三 顺天、直隶、山东地区 .....                   | (85)  |
| 四 湖南、湖北地区 .....                      | (91)  |
| 五 福建、广东地区 .....                      | (93)  |
| 六 其他地区 .....                         | (96)  |
| 第三章 汉学的新著述 .....                     | (104) |
| 一 小学 .....                           | (105) |

|                               |       |
|-------------------------------|-------|
| 二 经学 .....                    | (118) |
| 三 史学 .....                    | (131) |
| 四 诸子学 .....                   | (137) |
| 五 校讎与辑佚之学 .....               | (140) |
| 六 新著述所反映晚清汉学之特点 .....         | (144) |
| <br>第四章 批评与会通:晚清汉学与宋学 .....   | (155) |
| 一 宋学对汉学的批评 .....              | (155) |
| 二 汉宋会通之趋势 .....               | (167) |
| 三 “不分门户,非为调人”说 .....          | (177) |
| <br>第五章 排斥与吸纳:晚清汉学与今文经学 ..... | (218) |
| 一 争论与排斥 .....                 | (218) |
| 二 认可与吸纳 .....                 | (238) |
| <br>结 语:晚清汉学的趋向 .....         | (259) |
| <br>附 录:晚清汉学家省区分布表 .....      | (263) |
| <br>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            | (339) |
| <br>后 记 .....                 | (355) |

## 绪 论

清代学术发展到乾嘉时期,形成了以考据为主的学术流派,因当时的学人大多以回溯东汉经学为主旨,此时期的学术遂被后世称为乾嘉汉学。这个时期,名家辈出,经学与史学,均取得很大的成就,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之高峰。但嘉道以降,社会各方面开始产生诸多变化,学术也因之而变动。曾被清初顾炎武等学人强调的“经世”思想,被重新予以发明。隐没千年的今文经学,因为常州学派的鼓动,出现了复兴之势。理学及诸子学也都有复兴的表现。在这种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中,不少士人开始重新考虑学术动向的问题。此后,士习逐渐发生改变,部分学人由纯粹的汉学考证,走向讲求义理,且甚有倡言汉宋调和者。凡此种种,都使得晚清学术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此变幻繁复的局面中,曾经占据学界主流的汉学有何表现?晚清时期依然恪守汉学的学人大体多少?其与当时的社会有何联系?在学术层面,晚清汉学自身学理有哪些发展变化,其成就有哪些?汉学学人及其学说与其他学术思想以及学术群体有何关联?其总体趋向究竟为衰落抑或发展?诸多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

对于乾嘉汉学,学界成果颇丰<sup>1</sup>,但对嘉道以降至于清末的晚

清汉学,整体性的研究论著尚不多见。不过,近百年来学界不同程度地论及晚清时期的汉学,也形成了一些为人所接受甚至趋于“固化”的观点。以下,就将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予以总结和评论。

第一,对晚清汉学的总体评述。

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晚清汉学在学术言说中,呈现一种由简趋繁的走势,学界一般认为汉学在嘉道以后趋向衰落,甚至已经结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

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sup>2</sup>。

杨东莼同样指出:

嘉、道以后,庄存与崛起,提倡今文学(即常州派),以与朴学分立;到这时,朴学才渐次走到它的衰落时期。<sup>3</sup>

大约同时的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也认为“大体乾嘉学者是古文派,道咸学者是今文派”<sup>4</sup>。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认为,“江藩和阮元已经结束清代汉学史了”,而其衰亡的主因正在汉学家“纤小细腻”的琐碎治学方法根本无法回应近代中国寻求“真理”与“人类解放”的历史主题。<sup>5</sup>在侯先生这里,汉学已不是衰落的问题,而是“结束”了。

不过,也并非无异说。民国时期常乃惠就观察到:

晚清的思想界虽然受今文派的影响很深,但其实学界的正统仍是古文派,因为古文派虽然过于拘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们所用的方法乃是严格的科学方法,所得的成绩乃是正确可靠的成绩,无论谁也推不倒的。<sup>6</sup>

但持这种观点者毕竟不多。此后,学界对晚清汉学或不予置评,或承接前人之说,多以“衰落”论之。

近20年来,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著,对晚清汉学的总体评价同样存在上述两种意见,但研究明显更为深入。

戴逸《汉学探析》一文认为,“汉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说,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弱点”,学者们“钻在圣经贤传里面,为经典做注释”,汉学逐渐“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进入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汉学衰落了”<sup>7</sup>。黄爱平也认为,在乾隆末年,由于社会诸方面的原因,“盛极一时的汉学走向衰落”<sup>8</sup>。

持“并未衰竭”说的学者亦不乏其人。如吴雁南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虽然承认“汉学在乾嘉时期达到鼎盛之后,即逐渐走下坡路”,“开始走向衰落”,但提出“从‘汉学’本身看,尚未至于衰竭”,毕竟仍有陈奂、刘文淇、刘毓崧父子、郑珍、俞樾、孙诒让等汉学素养深厚的学者。<sup>9</sup>陈居渊也认为,“严格地说,嘉道以后的学术研究,并非今文经学一家独盛。而乾嘉以来的朴学研究也终究不是学界的配角,仍然保持了乾嘉朴学的传统”<sup>10</sup>。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一文,讨论的是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分期,其中有两个阶段在晚清时期。其一为“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的这段时期,其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的时段。文章认为,前一个阶段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从总趋势看,考据学仍在深入发展”;后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在后世发扬光大,影响深远”<sup>11</sup>。

近些年,开始有学者对晚清汉学展开专门讨论。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一文,从学人群体、地域分布、学术成就等方面对晚清汉学做出了比较全面地评估,并提出了嘉道年间“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的看法,是目前学界所见专论晚清汉学的第一篇论著。<sup>12</sup>罗检秋则发表《晚清汉学传统之演变》<sup>13</sup>、《清末正统汉学家的学术二重性》<sup>14</sup>、《晚清汉学的源流与衍变》<sup>15</sup>等系列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专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sup>16</sup>。在该书中,罗先生主要探讨的是自乾嘉以来形成的“汉学传统”如何在嘉庆以降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中转化和传衍,分析了汉学、汉学家自身与政治、社会等环境的关系,认为在方法论和治学精神的层面,“汉学传统”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时期。麦哲维(Steven B. Miles)《考证学的新面貌》一文通过分析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认为,考证学在道光朝以后“已经变成一个被各种学派和各地学者使用的工具”,考证学在晚清“并未被消灭,反而是被中国各省的学者所接受了”,“清末的学术并不是对于乾嘉考证学的一大反动而是它的延续发展”。<sup>17</sup>王惠荣《晚清汉学家与近代社会变迁》一文认为晚清汉学家“成为影响近代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的重要学者在朝野均有号召力,不仅“对近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新事物的传衍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且领时代潮流之先风,在历次大的社会变革中均有涉足”。<sup>18</sup>

第二,对晚清汉学具体问题的讨论。

从目前学界研究情况来看,汉宋学关系、汉学与今文经学是研究重点,一些重要汉学家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但对于汉学与日本学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次要学人的个案研究,论著相对偏少。

(一)晚清的汉、宋学关系问题。大体说来,学界一般认为二

者之间以调和为主要趋势。龚书铎、孙燕京《道光间文化述论》一文认为,“道光间,出现了汉宋调和,汉宋会通或汉宋融合。汉宋调和是道光年间儒学的一个特点”。作者并指出汉宋调和有三种形式,“一种情况是对汉学宋学无所偏倚”,一种是“主张宗汉而不废宋”,第三种是“尊宋并兼采汉”。<sup>19</sup>这些观点为学界所认可,不少论著如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sup>20</sup>、魏永生《清中晚期汉宋学关系研究》<sup>21</sup>、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sup>22</sup>、张昭军《晚清汉宋调和论析》<sup>23</sup>等文,均以讨论嘉道以降汉、宋学调和为主。暴鸿昌《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则认为汉宋学之间仍有争论,但晚清汉学家面对宗宋学者的批判,很少有过激的回应,反而注意吸收宋学的长处。<sup>24</sup>张昭军《义理与考据之辩——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以宗宋学者的言论为基点,对晚清时期宗宋学者批判汉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归纳。<sup>25</sup>陈居渊《论晚清儒学的“汉宋兼采”》一文,则从“宋明以来儒学自身的发展、学界由尊‘理’向崇‘礼’的转换、宋学体用与汉学经世并重、排击今文经学与维护儒家中心正统地位等四个方面”,对晚清汉宋兼采的观念进行了论述。<sup>26</sup>此外,海外学者在汉宋学关系问题方面的论述与大陆学者视角有所不同,值得注目。王家俭《由汉宋调和到中体西用》一文认为,晚清学术界“西汉的微言大义之学与汉宋的调和之论”相继兴起,历经“中西调和”直至“中体西用”,反映了儒学在世运中的变迁。<sup>27</sup>张寿安以嘉庆间张成孙与方履簣的论辩、道光初方东树的“礼”、“理”论辩和道咸间黄式三与夏炘、夏炯兄弟的论争为研究中心,认为汉宋之争持续甚久,而且“‘礼’‘理’二概念才是汉宋学在思想上产生争议的焦点”<sup>28</sup>。张丽珠认为,既有对“汉宋之争”的研究,往往在汉学主训诂、宋学讲义理这样一个思维套路中进行探讨,但实际上汉宋学难以调和的“根本歧见”,是

在同属于义理之学的范畴之内,汉学家所讲的义理和宋学家的义理观念,根本不能调融,这是义理内部汉与宋的对立,而并非所习见之训诂与义理的对立。<sup>29</sup>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则对清代科举考试和汉学的互动关系做了考察,发现在道咸之后,科举试卷的策论部分,渐渐出现数量较多的蕴含汉学与宋学争论的题目,并展现出汉学压倒宋学的倾向。<sup>30</sup>

(二)晚清汉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问题。刘大年《评近代经学》一文,重点讨论了近代时期今古文学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该文把近代今古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夕、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其以后、维新运动时期以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和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在第一个阶段,作者着重描述今文经学的兴盛情况,谈及宋翔凤、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学家,但指出宋、刘等人的今文经学,“名之曰讲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其实仍没有脱离书本的旧套”,“他们的今文经学与同一时间的古文经学一样,著书满家,思想像个空壳”,因为他们不能“像龚自珍、魏源那样参加到时务论说里去,讨论‘世情民隐’”,所以“人们从那里得不到认识历史发展和了解社会生活的启示”。作者认为,第二个阶段今古文经学“同时衰落,认识停滞”,但“并不是从此中断”,“如果注入新的思想,改换一种角度,今文学还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古文学在思想观点上更需要研究讨论”。第三阶段,“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并起,学术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今、古文学家章太炎、张之洞、刘师培和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围绕着学术与政治问题,发生了两次重大论争;最后一个阶段,今古文两派虽然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但面对经学的衰落,两者有趋同的趋势,且在“尊孔读经上,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终于合流”。<sup>31</sup> 刘大年此文虽以《评近代经学》为名,但主要研究嘉道以来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关系

问题,且重在学术与政治的合离,并未完全进入到经学学术本身中去。龚书铎《略谈张之洞的儒学》一文,以尊古文的张之洞为主要讨论对象,但提出张氏“并不绝对排斥今文经学”的观点,为深入认识晚清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sup>32</sup>罗检秋则以经世之风为切入点,认为“嘉道以后,经世致用学风逐渐弥漫士林,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今文经学而理学,最后扩展至古文经学的过程”<sup>33</sup>。彭明辉也认为清代的今文学家如庄存与虽“强调微言大义”,但治学“不拘汉、宋”,于“汉学、宋学有益经世者均加以采掇”<sup>34</sup>。这样一来,汉学与今文经学就有了融合的基础。

(三)晚清汉学与日本学界的关系问题。阎红生《但论文字总相亲:俞樾与日本汉学家的交游》和张欣《俞樾与近代日本汉学》两文,论述了晚清汉学名家俞樾和日本汉学家竹添光鸿、留学生井上陈政等的交往情况。<sup>35</sup>张晶萍《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一文,则全面展示叶德辉与日本学人的学术交往及其自身对日本的认识与理解。<sup>36</sup>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一书中有《狩野直喜》一章,描绘出约当于晚清之时,尊奉古学的岛田篁村、狩野直喜等人对儒学传统的承继以及同中国宗汉学者交往的情况。<sup>37</sup>林庆彰《竹添光鸿〈左传会笺〉的解经方法》一文,论述了日本汉学家竹添光鸿治《左传》的学术成就,并认为当时日本学者为群经作疏是受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汉学家重疏十三经风气的影响。<sup>38</sup>陈玮芬《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一书,着重于研讨近代日本汉学发展中“典范”的流变,其中对日本“汉学塾”的分析,值得参考。<sup>39</sup>

(四)晚清汉学学术个案。对晚清兴起的边疆史地考证之学等,学界多所关注<sup>40</sup>。晚清朴学与经世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亦有专论。<sup>41</sup>学人的个案研究,成果亦较多,特别是对于四位汉学

重镇: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不但均有专著问世,专文更是不胜枚举<sup>42</sup>。而其他一些宗汉学者,如黄式三、黄以周父子<sup>43</sup>、刘宝楠<sup>44</sup>、郑珍<sup>45</sup>、莫友芝<sup>46</sup>、王先谦<sup>47</sup>、陈澧<sup>48</sup>等人的学术思想,也都有成果出现。

从前述可见,学术界对晚清汉学已有一定的研究,对其发展的大致趋向、汉宋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今文经学关系等问题,均有讨论。但仔细讨究,则前人之研究尚难称完善。首先,对于晚清汉学的脉络与趋向问题,特别是究竟在什么意义和层面上,汉学衰落或是发展了这样的问题之上,学界尚缺乏更为深入的考察。其次,在汉、宋学关系问题上,对其“调和”一方面强调较多,但对于二者持续的对立,则有所忽略。而“汉宋调和”的观念是否与当时存在的“不分门户”之“会通”思想完全等同,也未见清晰的说明。再次,汉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究竟怎样,当时的学人对此问题有何解读,均可作更为详细的讨论。学术界主要探讨排斥的一面,而对于其吸纳的一面,虽有研究,但尚需较为系统的清理。而且,对于汉学是否包含今文经学的问题,学界也莫衷一是。最后,对于汉学家个案的研究,虽然名家备受关注,但一些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失语者”,亟待挖掘和探讨。

晚清汉学上承乾嘉,下启民国,有其自身的变化和特点。鉴于学界研究现状,本书重点关注如下命题:

(一)“晚清”与“汉学”的概念。在一般近代史的研究中,晚清多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这在有近代史学科以来,几成定论。但海外学界有不同看法,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便以1800为晚清之始<sup>49</sup>。而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提出,也为观察清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工具<sup>50</sup>。这都说明必须认真思考对于学术史意义上的“晚清”,是否应该有其专属的定位。学术

史的发展除和社会、政治等有紧密联系之外,其内部的衍变也是重要的动力,故以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后果的角度来看,将学术史的“晚清”开端置于1840年,便需要进一步斟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文化史、思想史的分期问题,或提出文化史分期与政治史、经济史往往不同步,或提出近代启蒙思想史应以康有为为节点,或认为应重视嘉道年间学术风气、思想变化等对清季学界的影响等等<sup>51</sup>,这说明学界在厘清认识方面已经开始做出努力。如果能把学术史上之“晚清”予以界定,则一些可能产生疑惑的问题,即可稍息其争。如马瑞辰、陈奂等人,有论者视之为乾嘉学者,但从他们重要著作的撰作时间多在道光间这点来看,则当属晚清学人。

对于“汉学”的概念,目前学界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当指东、西两汉之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仅东汉学术才是清儒所谓“汉学”。张之洞曾说: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韵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sup>52</sup>

如此,汉学在学理上应先通小学,次则以考据通其史事,其旨归乃在明圣贤经义。汤志钧说:

由顾炎武“复兴”的清代“汉学”,一般通称为清代古文经学;他们这一学派,也通称为清代古文经学派。<sup>53</sup>

朱维铮也认为:

所谓汉学,本指否定宋学、唐学而恢复贾、马、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sup>54</sup>

可知诸家多以清代汉学为“古文经学”或“东汉经学”。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清季魏源举西汉韩婴、董仲舒,东汉班固、徐幹等人以“大义为先”之例,证乾嘉间治今文学者庄存与因治经方法与当世汉学家不同,“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并慨叹庄氏所为“异于世之汉学者”,实乃“真汉学”。可知魏源认为汉学是指两汉时“大义为先”之学说。<sup>55</sup>蒙文通则认同廖平、刘师培对清代汉学的批评,认为“考据之学无事于经术,称考据为汉学者陋矣”<sup>56</sup>!周予同明确提出汉学当指“两汉与清代的学术思想的主潮”,但清代的汉学与“汉学”“似一而实二”,其“只是两汉学术之支裔的重兴,而决非两汉学术之本体的复活”,但从演变过程看,则是从“后汉古文学蜕变而为前汉今文学”。<sup>57</sup>罗检秋对“汉学”一词的语源作了详细梳理,提出在其著作中的汉学所指,大体“既涵盖乾嘉古文经学及其流风余韵,又包括嘉庆以来的今文经学”<sup>58</sup>。台湾学者林庆彰则认为“乾嘉学者所崇尚的汉学,当然是东汉的汉学,所以才有‘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说法”<sup>59</sup>。从这些论断可知,对于汉学概念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对汉学深入研究与分析,故尽力明辨概念,是研治晚清汉学的重要前提。

(二)晚清汉学的演进与分期。对于晚清汉学的脉络与进程问题,学界尚缺乏更为深入的考察。前述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一文,将清代考据学在晚清阶段分为“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和“甲骨卜辞发现以后”两个时期。罗检秋在其关于汉学传统的著作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但文中多以道咸、同光为界<sup>60</sup>,且标示出不同时段的特点,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此问题上的见解。笔者以为,若结合时段与特色,不妨将晚清汉学的演进分为道光、咸同、光宣三个阶段,而在光宣时期又可分为“今古文论争”、“西

学传播”及“新材料的发现”三个专题,因为此三者 in 光宣时期的汉学演进中有较为典型的表现。这样,可大致归纳出三个不同时段汉学的特点与新变化。如果同时对晚清汉学的地域分布和著述情况按照专题作一归纳概括,即可更为细致地展示出晚清汉学的总体状况。

(三)对汉学学术本身及其外围环境的分析问题。晚清汉学作为乾嘉汉学的延续和发展,其在学理方面有哪些新的成就和变化,需要对重点人物和重要著作做细致而深入的研讨。从目前学界来看,对晚清汉学的研究多在“外部”问题打转,而如何深入到学术内核去,使学术史真正成为“学术”之史而不是学术“关系”史,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sup>61</sup>此外,在研讨汉学自身时,如果把汉学作为在历史社会背景中的“事件”去讨论,可以更好地看到学术和整体社会的互动情况。进而言之,如果能把汉学视为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合体来做进一步深研,应该有助于观察彼时学术和政治的互动状况。<sup>62</sup>这里不妨可以借鉴从马克斯·舍勒到卡尔·曼海姆以来形成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观点<sup>63</sup>,来观照学术思想与社会群体、制度构造、民族精神等社会文化之间丰富的联系。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在晚清尚存在一些宗汉学者,他们读书治学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包括藏书、耕作、交游、游艺、情感,以及与盐商、幕府等群体与机构的关系等,大多还没有得到较为完整的发掘与描述。最近几年学界整理了一些汉学家的日记等,可以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sup>64</sup>做这样的分析,无论是汉学本身抑或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均会使其显得更为生动与丰满。

(四)晚清汉学的学人谱系。乾嘉汉学由于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其谱系为后人所熟知。但晚清汉学的学派与人脉究

竟是怎样的图景,尚需仔细地清理。罗志田曾以梁、钱二人学术史著作为例,指出近代“乾嘉汉学一线”为人所忽视,希望把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汉学家或偏汉学者的论著汇聚表出,反映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sup>65</sup>从既有研究看,前述史革新所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等文以地域为界分,大概介绍了晚清宗汉学的学人群体的分布情况。但要把当时汉学学人之间的脉络关系予以澄清,以见更广泛的学人群体和学术之间的关节布局,仍需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才能为晚清汉学描绘一幅较为精准的地图。此外,对于汉学家个案的研究,在考察重点汉学家的同时,当尽力考察晚清宗汉学的一般学人甚至是“小人物”群体。虽然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理应受到较多关注,但一些名气稍逊,但学术上也较有成就的宗汉学者如许瀚、苗夔、曾钊、邹汉勋、蒋湘南、丁晏、陈瑒、雷浚、徐灏、周悦让、王金城、吕调阳、于鬯、王仁俊、李祖望等,却一直没有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是空白。而且,即便是王先谦、黄以周等身处“前台”的汉学学人,研究其学术思想真正有分量的论著,也并不多见。此外,如陈衍这样早年致力于经学研究且学宗汉学者,由于长期被定位为“同光体”诗人,以致其学术思想为人所忽略<sup>66</sup>。总之,学界对于晚清汉学学人的连贯谱系,较诸乾嘉学派,远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五)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西学的关系。汉学与宋学在道咸时期逐渐从争执走向会通、融合,学界对“调和”一面强调较多<sup>67</sup>,但对于二者持续的对立,则有所忽略。而且即便在调和汉宋学的学者内部也存在一个“不分门户、非为调人”,反对“调停”的观念。另外,有论者提出研究汉宋学关系时,还应关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